

# 日军山西毒气战研究的新进展

——评栗屋宪太郎的

《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

高士华

2003 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伤人事件,特别是中国的齐齐哈尔更是出现了牺牲者。因此,对日军毒气研究,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层面,其意义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学术界,也都成为必须。2002 年出版的《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大月书店),就是日本学术界很重要的一部力作。该书由栗屋宪太郎主编,宫崎教四郎、松野诚也、丰田雅幸、小田部雄次等人参加调查、写作,汇聚了以山西省为中心,以毒气受害平民为主要对象,从 1999 年到 2001 年 3 年间以共同作业方式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集体研究成果。

主编栗屋宪太郎是在日本非常活跃的旧日军毒气问题专家。他 1983 年夏天在华盛顿的国立公文馆首先发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的中国化学战例证集。该资料 70 页,其中的 56 例战例证明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过大规模的毒气战。在此以前只是有士兵证明日军使用过毒气,而根据日军自己的正式文件来确证,这还是第一次。有关该文件的研究第二年 6 月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吉见义明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发现了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关于 1938 年秋武汉作战时,实施化学战的极密文件。就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揭开了日本毒气战研究的序幕。1985 年 9 月号的《世界》杂志发表了他们

合作的《毒气战的真实》一文,轰动日本。此后,两人又于1989年共同编辑出版了《毒气战关系资料》(不二出版社),1997年吉见义明和松野诚也出版了《毒气战关系资料2》(不二出版社),有关毒气战历史的研究进入实质性的科学研究阶段。而《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是以栗屋宪太郎为中心的几位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该书有25万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4编,由4位作者的研究成果组成:

### 一 《山西省毒气调查的意义》(宫崎教四郎)

他指出,选择山西为调查对象的理由是,山西是最初正式使用毒气的地区,而且时间最长、种类和回数也最多。该部分从加害和被害两个方面,发掘整理分析日军的资料,对中国战时资料、战争审判的资料也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时进行现地调查,也和日方资料进行了对照分析。并指出,1938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对华北方面军发出了在山西一带使用毒气的命令,同年7月,在对全中国使用之前,利用和他省隔绝容易隐瞒的特点,第一军第二十师团在晋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1939年5月,陆军参谋本部指示日军在山西的偏僻地区实验性地使用了更为强烈的毒气黄剂,真正地大规模使用是百团大战最激烈的1940年8月到12月之间,毒气的毒性也逐步升级。从使用的回数来看,约2/3集中在这1938年到1940年的3年之间。这主要是日军认识到了八路军的威力,同时也是为了对八路军进行报复,在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残酷扫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毒气。

调查地点,选择了以太行山根据地的周围作为中心。虽然有资料证明日军对国民党军队也大规模使用了毒气,但由于日军和

国民党军打仗时,很多农民躲到了山里,很难证明毒气使用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他们的调查集中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周围作为中心的区域,虽然毒气的使用分对八路军和平民两个部分,但因为对军队的调查很困难,所以集中地对当地的农民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调查。

## 二 《从日军资料来看山西省的化学战》(松野诚也)

该部分回顾了日军研究和使毒气的历史,指出日军使用最多的是中国,东南亚只是断续使用;中国又以华北为最,特别是和日军对峙的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山西省。1937年7月28日在华北的平津作战中,日军参谋本部发出了使用了催泪毒气的命令,这是可确认的最早许可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毒气的使用一方面是为了对付中国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将来的对苏作战进行试验和积累经验。其使用也经历了从次数和数量上逐渐增加的过程,并成为他们确保占领区打击中国军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担心使用情况泄漏,日军高层一开始一再指示避开和不要伤害到外国人。山西的抗日军队对付毒气的的能力低,多山地比较封闭,交通不便,使用情况不容易为外人所知,游击区的老百姓对日军怀有很深的敌意等原因造成了日军在山西大量使用毒气的情况。

## 三 《从中国资料来看山西省的毒气战》(丰田雅幸)

该部分指出,1999年7月30日中日签订了关于原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开始了真正地处理。但是由于该研究从80年代才开始,日本国内对毒气的危害性还缺乏充分认识,日本政府更是只承认了一部分事实,这和战犯审判有很大的关系。东京审判前,远东国际法庭曾指出日本在中国使用了毒气,并派人到

中国进行过调查,国民政府也提出了证据,但后来没能立项,也没有成为审判内容。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这和昭和天皇没有被起诉一样,不难想像它背后的政治运作。而美国在其中起的作用,更是给人更多的想像空间。

关于中国的审判,作者指出,战后国民党政府的审判只有涉及在湖北使用毒气的一件,而这件审判资料,直到 1998 年 6 月 13 日本外务省公开外交文件后的第二天,《每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才广为人知。抗战结束后,在山西的日军没有任何人因为使用毒气而受到审判,这应该和战后阎锡山为了利用残留日军协助对付共产党,同日军勾结有关系。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审判,作者指出,1949 年以后的中国战犯审判,涉及到的使用毒气罪行有 3 人 4 件,但都集中于河北省,不是以此罪名被起诉但参与过毒气战的人还有 6 人,在免于起诉者中间也有人交代参加过毒气战。

作者根据中方资料指出,日军在山西从 1937 年到 1945 年不间断地使用了毒气,具体记录有 301 件,最早的是 1937 年 9 月 6 日,日军在进攻天镇南边的盘山时使用了毒气。就是在战争结束后的 1945 年 8 月 23 日,日军还对进攻汾阳县城的八路军使用了毒气,致使 67 名八路军战士死亡。

据作者指出,虽然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拒不承认使用过糜烂性毒气,但是,山西日军的证词里早就承认使用过。

#### 四 《山西省被害调查的成果和课题》(小田部雄次)

作者在 1999 年 8 月和次年的 9 月在山西省进行了 12 天的调查,主要调查的是定襄、榆社、武乡、襄垣、左权、黎城、沁源、平鲁、壶关等 20 多个地方。作者利用统计的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

析,对毒气使用的方法和毒效也结合资料进行了对比。

该书的第二部分分为:毒气战被害者的证言记录(1999年至2000年的调查成果)和补录(有关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日本政府和旧日军有关的答辩、驻屯军队和关连军人表)。调查证实,山西是日本大规模使用毒气的地区之一,特别是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实施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对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太行山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报复中,大量地使用了毒气,其中很多平民成为毒气战的牺牲品。从1938年7月第一军第二〇师团在晋南作战中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毒气以来,日军在山西不间断地使用了毒气。1939年5月,陆军参谋本部同意在偏僻地区实验性地使用更为强烈的毒气。日军使用毒气的基本规律是,随着战争进入于胶着状态,日军使用的毒气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强烈。根据实地调查,该书对打喷嚏性毒气的非致死性进行了反驳,指出它具有很高的杀戮能力。同时,该书证明日军在山西使用了致死性糜烂性毒气。

实地调查是该书的一大特点。该书收集了50多人的证言,并附有证言者的照片。他们对中日文的资料进行了仔细的搜集研究之后,深入山西各地,踏访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收集他们的证言,并和历史资料互相参照,真实而可信地将日军当年在山西使用毒气的真相暴露在世人面前,其道德勇气和踏实的学风都值得我们钦佩。

书后附有日本参加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各种条约、日本国会有关的答辩记录、和当时日军有关地域的驻军序列,这对考察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

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于1997年生效,当时87个国家参加,现在已达到156个国家,日本是参加国之一,并承诺在1997年开始的10年内处理掉遗弃在他国的化学武器,1999年中日两国之间也签

署了有关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处理的备忘录,日方承认并承诺销毁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日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仍然在荼毒中国人民,齐齐哈尔“八·四”毒气泄漏和中毒事件就是明证。

1995年,日本当时的社会党议员团就到中国东北进行过考察,并向当时的村山政府提出积极处理的建议,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积极行动。日本著名的毒气问题专家、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在2003年10月10日的《朝日新闻》著文指出,如果日本行动得早,这次的齐齐哈尔和今年的日本茨城县神栖町的中毒事件就有可能避免。他还建议,在海外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方面,应该向日本旧军人收集日本在战败前后化学武器的配备和遗弃情况的信息,以做处理时的参考。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曾呼吁国民提供关于遗弃化学武器的信息,但这并不包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遗弃情况。而且,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但到现在日本政府也不承认使用过糜烂性毒气,正是这种遮遮掩掩、搪塞拖延的态度才造成了今天这种毒气仍然不断地伤害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日本过去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和今天对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处理的错误做法都需要清算,而《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一书具有很好的参照意义,是解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情况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其严谨的研究风格特别是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有很好的实地考察的条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搜集证词等口碑资料,并出版了相关著述。但要把日军毒气战的历史彻底澄清,中日学者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作者高士华,1961年生,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